

# 明清时期云南建水地区的汉族移民 与地方科举发展研究

马斌斌

**摘要:**中国历史进程中移民伴随始终,王朝的更迭、频发的自然灾害和人们自发的趋利避害,都会促使大量移民的产生。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能动者,移民对移出地和移入地都会产生影响,在改变了移入地人口结构的同时,促使移入地的地方社会发生变迁。明清时期的移民,对移入地科举的影响尤甚,文章以建水历史上的汉族移民和科举发展为切入点,分析了建水历史上的汉族移民和科举发展之前的内在关联性。建水地区只是云南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 and 全国范围内的一个缩影,但滴水见世界,建水地区并不是特例。

**关键词:**移民 科举 地方社会

**中图分类号:**C954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2096 - 434X (2024) 05 - 0009 - 08

## 一、引言

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,移民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。自传说时代黄帝和蚩尤逐鹿于中原时,战败后的蚩尤率众从河湟谷地外迁,到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战乱和朝代更迭,都伴随着大量的移民。每一个“英雄祖先”和“兄弟民族”的传说<sup>①</sup>和叙事背后,都蕴含着移民的主题。早期的移民既有中央王朝强制下的“移民实边”、充军发配、流放、屯兵随迁等的大型迁移,也有因战乱和居住自然环境等的改变,以及生活所迫而导致的自愿迁移,因而依据被迁者的能动性,则可以分为自愿性和非自愿性两种。加入统治集团或中央王朝的角色,则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统治集团导型和非统治集团主导型,如果对移民群体进行细分,则可以分为整体迁徙和部分迁徙等。由于移民类型多样,迁移因素多元,因此围绕移民展开的研究卷帙浩繁。在中国知网中用“移民”做篇名检索约3.2万篇,以“移民”做关键字检索可找到约4000余篇的文章,在如此众多的期刊文章中,围绕“移民与科举”展开

**作者简介:**马斌斌,红河学院民族研究院讲师,中山大学民族学博士,研究方向:边疆治理、历史人类学与西南研究;云南,蒙自,661199。

**基金项目:**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(21XMZ021)。

<sup>①</sup>王明珂:《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——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。

的研究仅有50余篇,涉及移民与地方科举的不足10篇。<sup>①</sup>在这众多的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中,也有许多关涉云南<sup>②</sup>地区。

除期刊论文外,1986年田方和陈一筠主编的《中国移民史略》<sup>③</sup>用整整一章(第四章)内容来集中讨论了明代外地移入云南的移民类型、人数及其分布问题。葛剑雄等1993年主编的《简明中国移民史》<sup>④</sup>和1997年出版的六卷本《中国移民史》<sup>⑤</sup>中,都有对云南地区移民问题的论述。这些研究立足于中国全国,整体地分历史阶段、分地域的讨论移民问题,为后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和思路。郝正冶于1998年完成了《汉移民入滇史话》<sup>⑥</sup>一书,以汉民族入滇为主导,梳理了历史上汉族群体移入云南的历程,尤其对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记忆进行了详述。陆韧继郝正冶后,继续讨论了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的问题,在《变迁与交融》一书中,陆韧全面论述了整个云南地区明代时期的移民类型、特点,以及移民对云南地区的影响,指出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之后,在明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土著化过程。<sup>⑦</sup>秦树才则以云南绿营兵为研究对象,以汛塘为中心,指出清代的绿营兵既是一种兵制,也是一种移民类型,而且在清代的移民中,其所占人数较多。这些绿营兵由外省进入云南,然后由于设防,又由云南腹地移向边疆地区,其本身构成了清代云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<sup>⑧</sup>苍铭则将云南地区的移民划分成秦汉—元明,清代—民国和20世纪下半叶三个阶段,并结合这三个阶段分期,针对不同的移入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,并对移民的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了讨论,指出移民对边疆巩固和经济发展、对文化的传播以及民族关系都产生一定的作用,移民不仅巩固了边疆,而且加速了边疆地区的发展,加速了文化的传播,与此同时促进了局部地区的民族融合。<sup>⑨</sup>王瑞平在研究明清时期云南的移民问题时,集中讨论了移民与儒学传播之间的关联,同时对云南下辖地区的人口、科举、儒学发展等进行了分析和呈现,但主要聚焦点仍在移民。<sup>⑩</sup>已有的这些研究,从多个面向对移民问题进行了阐释,但无一例外的是,这些研究都未明确论及移民与地方科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。作为极具参考价值的《中国移民史》,虽对移民的定义、类型和分期进行了详细考证,但在书籍中也未明确提及移民对地方科举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关联性。基于此,本文以云南建水为田野依托,以移民与地方科举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切入点,在历史脉络中呈现移民与建水地方科举的关系,来看移民对建水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影响。

## 二、建水历史上早期的汉族移民

移民进入云南的时间相对较早,早期氐羌族群沿藏彝走廊自北而南迁徙进入云南,自战国楚

① 中国知网检索,分别以“移民”为篇名、以“移民”为关键字检索所得,检索时间:2022年12月23日。

② 中国知网检索,以“云南移民”为主题进行检索,约有238条结果,检索时间:2022年12月23日。

③ 田方、陈一筠主编:《中国移民史略》,北京:知识产权出版社,1986年。

④ 葛剑雄、曹树基、吴松弟:《简明中国移民史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3年。

⑤ 葛剑雄主编:《中国移民史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7年。

⑥ 郝正冶:《汉族移民入滇史话——南京柳树湾高石坎》,昆明:云南大学出版社,1998年。

⑦ 陆韧:《变迁与交融: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》,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2001年。

⑧ 秦树才:《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:以汛塘为中心》,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2004年。

⑨ 苍铭:《云南边地移民史》,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4年。

⑩ 王瑞平:《明清时期的云南移民与儒学在云南的传播》,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11年。

将庄蹻开滇起,汉民族就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进入云南地区。<sup>①</sup>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管理,汉族移民也随即进入云南。<sup>②</sup>汉武帝于元封二年(前109)在云南设置益州郡,自此后,历经各朝代,都陆续有移民进入云南地区,明清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。何耀华经考证指出,“汉族形成以后,以多种原因被大批移居南中,其一是被作为屯军而移入;其二是因应征作战流落云南;其三是被作为‘死罪及奸豪’流放实边……;其四是因从事商贸而移入。”<sup>③</sup>从这一记载就可以看出,早在两汉时期,就有大量汉族进入云南。此外杨成志早先也对云南地区的民族进行了调查,指出“窃考云南直系土人的故乡,汉族之居此者乃历代相沿多由两湖、两广、赣、江、浙、川、黔、……诸省迁徙而来的。”<sup>④</sup>从这段考证中可以看到,云南地区的汉族作为“移民”,是从许多省区迁徙而来,并非来自某一地区,来自其他各地区的汉族在不同历史阶段进入云南,构成云南汉族的主体。元代征服云南地区时,随军出征的除了蒙古人外,还有大量的色目人、汉人,这些人作为移民的先导者,进入云南地区,而后屯军于此,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安家落户,逐渐成为云南地区汉族的先民,建水地区的汉族也不例外。除了元代随军迁徙至此的汉族外,也有其他自发迁徙至此的汉族群体。这一阶段可以视为汉族进入建水的第一阶段,这一时期迁移至此的有多少,在数字上未得确切记载,但作为汉移民的先导,无疑为后来者做了先决准备,到了明代,云南地区的移民进入高潮。

明代时,随着朱元璋“移民就宽乡”的政策,<sup>⑤</sup>云南地区随即成了“宽乡”之地,成为移民迁徙的目的地,随之军屯、民屯、商屯相继出现。不仅如此,明代还改变了元制,将滇南地区的临安府治迁徙至建水,在建水设置了临安卫所,建水作为府治的附廓,土城被易为砖城。明代的这一举措,将滇南地区军政中心南移,方便了对南部各民族的控制,同时可以防范交趾的侵扰,护卫滇南交通干线,继而促使汉人聚居地向南部推进,在明代以前很少有汉族居住的滇南建水、石屏一带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汉族移民新区。<sup>⑥</sup>明朝的移民类型是多样的,而且移民人数居多。如前所述,明朝在云南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屯兵,根据当时明初制定的“军人身份世袭,屯戍必须携家属的制度,就使军队的驻防和调动在实际上成了移民运动,形成明代移民的一大特色。”<sup>⑦</sup>明洪武十五年(1382)明军平定云南后,便在建水地区设了临安卫,临安卫驻扎着5个千户所,共有兵士5600人及家眷,这一时期进入的汉人大约2万人。<sup>⑧</sup>这些人进入建水后,便在此住居下来。

史载明洪武二十三年(1390),“云南都司领云南左卫(驻今昆明东部)、右卫(驻今昆明西南)、前卫(驻今昆明西南)、临安卫(驻今建水)、曲靖卫(驻今曲靖西部)、金齿卫(驻今保山)、大理卫(驻今大理南部)、洱海卫(驻今祥云东部)、楚雄卫(驻今楚雄东部)等九卫,共有军官一千三十五人,士卒八万七千三百七十人。如果每军户以三人计算,这一年在云南的军屯汉族人口就达二十六万五千二百一十五人。这个数字未包括后来设置的澜沧、腾冲、大理等十卫及二十二个千户所的数字,

① 郝正治:《汉族移民入滇史话——南京柳树湾高石坎》,昆明:云南大学出版社,1998年,序言第1页。

② 申旭:《云南移民与古道研究》,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68页。

③ 何耀华总主编,朱慧荣主编:《云南通史》第二卷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年,绪论第31-32页。

④ 杨成志:《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》,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3年,第42页。

⑤ 尤中:《尤中文集第2卷》,昆明:云南大学出版社,2009年,第301页。

⑥ 陆韧:《变迁与交融: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》,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200页。

⑦ 葛剑雄、曹树基、吴松弟:《简明中国移民史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3年,第393页。

⑧ 曹荆,谭晓云:《南疆邹鲁——建水》,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3年,第4页。

按规定编制,官兵人数总共十三万一千四十人(户),若以每户三人计,总人口为三十九万三千一百二十人。这些汉人分别来自江西、浙江、湖广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四川等省。”<sup>①</sup> 这些总数达39万之多的人口,被分布于各地,这些人无疑增加了当地的人口,虽然其都是卫军,但都可以视为移民。除了军屯外,明代在云南的移民还包括一些沐英“请移”的移民,明代平定云南后,召回傅友德和蓝玉大军,留沐英镇守云南。明洪武二十二年(1389),沐英前往南京觐见明太祖,从南京返还云南时,“携江南、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,给予籽种资金,区划地亩,分布于临安、曲靖、云武、姚安、大理、鹤庆、永昌、腾冲各郡县。并奏移山东、江西富民六十余万户充滇”。<sup>②</sup> 在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到,沐英所“携”之众,就有在临安地区分布的,至于具体安排了多少,并无确切记载。又过了两年,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),沐英“又奏请移湖南、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,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,帝均允之”。<sup>③</sup> 移“八十万”可能在数字上有些夸大,但前后的移民可能不在少数,这些移民都被分布在各地,沐英也在各地区设置了沐庄。明朝时期,随着临安府治的迁移和建水城池的修建,建水地区的发展日益兴盛,而且建水坝子适合居住和屯垦。沐英镇守云南时,沐英将先后请徙的江南汉族人口分布在于临安、曲靖、云武等地,作为最早开辟的沐庄,自然就吸纳了很多外来移民,这些人口作为沐庄的人员,服务于沐氏。到了清雍正九年(1731)清查人口时,查出沐庄人丁,“额外增出沐庄人丁三百七十八丁”<sup>④</sup>,显然这些人口一直是处于“隐形”的存在,是作为沐氏的私用人丁,不向王朝纳税的。

明代除了军屯、民屯和“请移”外,还有大量因经商产生的移民,在建水地区就有这一时期通过经商,而后落籍此处的人家,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张家和朱家。张家后人说,“我们家祖籍是江西的,老祖是明朝时候从江西到这点(里)的(建水),我们家老祖不是军队那种的,是做生意到这点(里)的。刚到这点(里)时,在西门外的兰坡头,后面才到这里(团山)的。”<sup>⑤</sup> 这种表于口头的传述,在族谱中也有相应地记载,团山张家合族族谱载,“始祖自明初由江西原籍,贸易入滇,寄居临安,后效张氏三选择里,至西门外十余里地,名团山者,遂建百世之业。历传至今,房屋栉比,子孙繁衍,竟成巨族。”<sup>⑥</sup> 张氏通过经商进入云南,而后在建水落家,据张氏后人自己著书称他们的“始祖张福于明洪武年间(1385-1390)由江西饶州府鄱阳县许义寨贸易至云南建水”<sup>⑦</sup>,此叙述中将时间定于洪武年间,始祖在建水定居后,励精图治,到了清乾隆时期,修建了张氏宗祠,“张姓始祖发籍江西鄱阳许义寨先辈正宗,氏族兴旺迁移云南建水团山村后世立祠”。迁移至建水团山后,张氏以“百忍家风”传世,历经明清至今。这种对“江西籍”的追溯,张家并不是特例,因明代徙江西、南京等地的移民众多,张家只是其中之一。

除张家外,还有朱家,明代临安府治迁至建水,临安卫城的修筑,提高了建水的政治和军事地

① 何耀华总主编:《云南通史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年,第66-67页。

② 何耀华总主编,何耀华、夏光辅主编:《云南通史》第4卷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年,第98页。

③ 何耀华总主编,何耀华、夏光辅主编:《云南通史》第4卷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年,第98页。

④ (清)范承勋,王继文,吴自肃,丁炜编纂:《(康熙)云南通志》卷9,康熙三十年刊本,阳明文库图书,第6页。

⑤ 访谈时间:2020年10月25日;访谈对象:张xx,男,83岁;访谈地点:团山皇恩府。

⑥ 2020年10月25日在团山访谈时,主人家拿出族谱给我观摩,经主人同意,我拍摄了族谱中的一些内容。

⑦ 张立永:《团山我的家乡》,昆明: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,2015年,第8页。

位。“操着不同口音的江南、湖广移民,已被‘区别田亩’的优惠政策所吸引。”<sup>①</sup>在这些被“吸引”的人群中,就有朱氏的始祖,他们随着军队一路行进至建水,并在临安城西边的高伍村留居。在朱家花园建水朱姓世系表中,他们的祖籍写着“湖南省麻阳县”,一世祖为“朱□”,生于明万历年间,居住西庄高伍村,后迁白家营村。<sup>②</sup>朱氏在建水落户后,经过明代的发展,到了清代达到了鼎盛,不仅在科举中出现“兄弟连科”,在经商方面更是独占鳌头,成为巨商,并在翰林街购地建造规模盛大的“朱家花园”。

此外,在明代还有以多种方式进入建水地区的移民。建水地方学者根据早期搜集到的《家谱》和墓碑记载,“明代落籍建水的汉族人口的籍贯,有城区朱姓,祖籍江南凤阳府临淮县,始祖朱铭,从沐英开滇,授永昌金齿右所百户,永乐年间调任临安卫左所镇抚,‘遂占籍临安’。城区叶姓,祖籍凤阳府凤阳县,始祖叶海,以战功授昭信校尉,洪武中调守临安卫后所,管屯田,‘在南庄叶官冲落籍’。城区王姓,祖籍浙江山阴,始祖王高山,明初从颍川侯傅友德军入滇,以领旗尉,爰临安山水清明,‘遂家焉’。城区刘姓,祖籍福建闽县,永乐年间四世祖刘均宝从戎至滇,‘落籍临安卫’。城区萧姓,祖籍江苏秣陵,始祖随明军平定云南,驻守临安卫,‘遂落籍建水’。”<sup>③</sup>由此可见,张家始祖和朱家始祖都于明初时,迁至建水地区,并发展成大家族,其家族在经商的同时,在科举等方面亦有显著贡献。张、朱两家只是这众多移民家族中的一个,但也是一种移民的镜像缩影,其作为这一时期的移民浪潮中的一员,为“边徼”之地的发展注入人力和物力。这一时期在建水地区落籍的汉族,以民屯的方式存在的也有不少。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屯户,在建水落地生根,在明以降的历史发展中,对建水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尤其在科举发展,这些姓氏的人群也不在少数。

清代平定云南后,移民依旧在继续,“清代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,一是汛兵塘卒;二是自发流人开荒为生的所谓‘流民’;三是商贾寓居者。移民流向主要是山区和边远府、州、县的土著民族地区。”<sup>④</sup>这一时期的绿营兵也成为移民的主导,这些“兵”不只是单纯的屯戍,根据这一时期的军制特点,绿营兵携带家属的,因而他们的屯戍此在数量上也不少。除清朝时期设置临元濠江镇,并派遣绿营兵驻守,从清初到道光十二年(1832)前,总兵额达到了12,526名,这些人进入驻地后,也就预示着一个家庭入住某地,其也就成了移民中的一部分。就整个建水地区而言,伴随着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屯兵屯垦、徙民等移民手段,汉族人口也极大地扩大,1923年进行人口调查时,建水地区的汉族人口已达102,572人,占总人口212,375人的48.3%。1953年人口普查时,建水、曲溪总人口达247,998人,其中汉族就有176,528人,占总人数的71%。1987年全县总人口431,537人中,汉族人口达297,736人,占总人数的70%。<sup>⑤</sup>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,建水县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建水县全县总人口(常住人口)为534,205人,其中汉族人口为321,746人,占总人口的

① 汪致敏:《朱家花园:滇南豪门的兴盛与隐退》,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3年,第9页。

② 2021年9月18日,在朱家花园抄录。

③ 墓碑和《族谱》多在特殊时期被毁坏,无法查找和重新考证。该论述参加建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:《建水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五辑,内部资料,1999年,第31页。

④ 何耀华总主编,朱慧荣主编:《云南通史》第二卷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年,绪论第71页。

⑤ 云南省建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建水县志:简本》,北京:方志出版社,1999年,第75页。

60.23%。<sup>①</sup>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,移民不仅改变了地方原有的人口结构,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地方社会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。这些汉族移民定居建水以后,在延续家族的礼教传统的同时,跻身于当地的科举事业,某种程度上带动和推进了建水地区科举文教事业的发展。

### 三、移民与地方科举的发展

科举是中国王朝统治时期的“抡才大典”,是王朝国家的一种选才(官)制度。李兵等经过具体考证指出,“‘科举’一词中的‘科’指考试科目,‘举’是选拔的意思,把这两个关键要素联系起来,‘科举’就是通过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。”<sup>②</sup>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,“科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选官制度。虽则历代科举制度的内容时有变革,原则上说,这是以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,授以官职的方法。选官的方法虽不限于科举,但是在传统社会中,这却被视为正途。”<sup>③</sup>因此通过科举迈入仕途,对个人而言,也成了社会阶级流动乃至社会流动的手段。科举制度起源于汉,兴于隋,盛于唐,成于宋。<sup>④</sup>汉代通过察举制选举官员,儒家经典被纳入科举内容,沿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,虽然这些制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“科举”,但仍是一种“选官制度”,可视为科举制度的雏形。到了隋朝时科举正式出现<sup>⑤</sup>,直至清末被废除,期间延续1300多年,在这一历程中,王朝通过科举不断纳贤,使其进入王朝官僚体系之中。参与科举者,则通过科举进行社会流动。而移民作为文化的载体,移民对移出地和移入地都有着重要的影响,在这诸多影响中,移民对地方科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。这些“移民”进入地方后,一方面作为流动人口,在人口上融入当地,通过参加科举,带动地方科举事业的发展,促进地方人文素质的提高。

史载,元代在云南初开科举时,前后中举者只有6人<sup>⑥</sup>,到了明代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据海崧统计,“终明一朝,共举行文科会试和殿试88科,取录进士24,657人。云南共参与文会试75科,考中文进士总数约为275人,则明朝云南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%左右。清朝全国共举文会试112科,取中文进士共26,849人,云南一共参加与文会试98科,考中文进士总数为682人,比明代增多了407人。同时,清朝云南文进士占全国文进士总数的2.6%左右。”<sup>⑦</sup>从元代的6人,到清朝时期占全国文进士总数的2.6%左右,云南地区在科举中已经占有一定的比重,建水地区的科举也是在这一历程中不断得以发展。田丕鸿通过对建水地方科举的研究,指出“明清两代,临安府考中文进士215人,武进士64人,文举人1935人,武举人885人,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,仅次于府治在昆明的云南府”。<sup>⑧</sup>在明清两代的中第者中,建水地区的考中者有占一半左右,明永乐九年(1411),建水考中了第一个举人,到明正统七年(1442)时,便有了第一个进士,据杨丰统计,明代临安府先后

① 2021年7月31日,建水县融媒体中心“古城建水”微信公众平台公报,并结合田野调研数据。

② 李兵、刘海峰:《科举:不只是考试》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18年,第12页。

③ 费孝通:《费孝通全集》第5卷,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9年,第447页。

④ [日]宫崎市定著,马云超译:《科举史》,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20年,第7页。

⑤ 刘海峰、李兵:《中国科举史》,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21年。

⑥ 蔡寿福、陶天麟主编:《云南教育史》,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282页。

⑦ 参见海崧主编《云南考试史》,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97页。

⑧ 参见田丕鸿,高建安编著《临安科举史话》,昆明:云南美术出版社,2010年,序言第6页。

共出现文进士30人(其中翰林6人)、武进士25人、文举人299人(其中解元5人、亚元5人)、武举人35人(其中解元7人),清代出现文进士37人(其中翰林7人)、武进士18人、文举人464人(其中解元7人、亚元7人)、武举人475人,明清两代共出现文武进士110人、文武举人1173人,在云南全境仅次于昆明。<sup>①</sup>这些数据都从侧面反映出明清时期临安地区文教之盛,正是因为因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绩,为建水地区迎来了“临半榜”之称。

在这众多的中第者中,许多人都是移民第二代,他们的祖先借着各种缘由到达临安地区以后,便在此落地生根,由于这些家庭对文教事业特别重视,秉持着耕读传家的家风,对儒家文化的研习,使得后辈们在科举中脱颖而出。如以倪高甲为首的建水倪氏家族,倪氏来自江南常州无锡县,在建水地区定居后,倪高甲考中乾隆十九年(1754)甲戌科第二甲第九名,倪高甲生有八子均成名,其中次子倪思莲考中清嘉庆乙丑科(1805)庶吉士,由翰林官至山西监察御史,三子倪思淳考清乾隆甲辰科(1784)甲辰科进士,成为庶吉士,成为翰林。<sup>②</sup>由于倪氏家族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就,他们家族便成为临安地区科第人文一门称盛,时称“一门三进士,同胞两翰林”。除了倪氏外,祖籍湖广麻阳县(今湖南省麻阳县)的朱氏家族也出现了“兄弟连科”,光绪十九年(1893)朱成章之子朱朝琛考中举人,出任贵州桐梓、仁怀县知县,光绪二十三年(1897)朱成藻长子朱超瑛参加乡试,名列副榜,授广东补用道。由于朱朝琛、朱朝瑛兄弟先后科举成名,家人特制“兄弟连科”的匾额悬挂家中,光耀门庭。<sup>③</sup>在整个建水地区,这些移民的后裔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不只有倪姓和朱姓,移居建水地区的一些主要汉族姓氏,如朱姓、叶姓、王姓、刘姓、萧姓、黄姓、郭姓、佴姓、曹姓、倪姓和师姓等,<sup>④</sup>在他们的后人中也有中第者,比如祖籍福建闽县的刘洙,祖先随明朝军队进入建水定居的萧崇业、傅为訔,祖籍四川巴县的陈世烈等,这些人都是移民后裔中第者的代表,他们中的刘洙、萧崇业、傅为訔等人也被供奉入文庙内的乡贤祠,成为受崇祀者。这些姓氏只是众多移民人群姓氏的一个缩影,中第者也是这众多移民后代中的一员,但侧面反映出移民对临安地区的科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
临安府在明代时下辖4州5县和9长官司,其中4州分为建水州、石屏州、阿迷州(今开远市)、宁州(今华宁县),5县包括通海县、峨峨县(今峨山县)、河西县(今属通海县)、蒙自县和新平县(后划归元江府),9长官司就包括纳楼茶甸土司(今建水县官厅镇和元阳县一部)、思陀甸长官司、左能寨长官司、落恐甸长官司、亏容甸长官司、溪处甸长官司(以上5长官司在今红河县境内)、教化三部长官司、王弄山长官司(以上2长官司在今文山县境内)、安南长官司(在今蒙自县东老寨乡)。可见明代时临安府的辖区是极其广的,因此在史书上临安地区有“北抵澄江,西连楚雄”、“南邻交趾”、“为滇上阕”、“边徼重地”等称谓,这些广袤的地区,在明代也是主要的军屯民屯之所。这些屯兵之处,在明代有着优厚的待遇,史料载:“重务卫学,凡卫所,独治一城者,特设卫学、教授一员、训导一员。官舍曰武生,俊秀曰军生,不给廩。其卫所与府州同治,不另设学,一体食廩,岁贡与民生

① 参见杨丰、汪致敏《学政考棚:滇南科举历史的记忆》,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3年,第95页。

② 参见田丕鸿、高建安编著《临安科举史话》,昆明:云南美术出版社,2010年,第413页。

③ 2021年9月18日,建水朱家花园田野调查所得。

④ 武德忠:《滇南千年古城——建水》,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2015年,第49页。

同。”<sup>①</sup>在这种政策下,这些军屯家属也就与当地一道,入学研习,并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,而不被视为“冒籍”。

如离石屏县城往西10公里的郑营村,在明代时就是军屯之所,郑营祖籍系浙江金华府江县,始祖郑太武在明洪武十四年(1381)随沐英部队入滇,后驻扎在蒙自县黑坡村,后其子郑以顺迁至现在的“郑营村”。据当地人介绍,“我们祖籍是浙江金华府江县,明代的时候,老祖公就跟着沐英的军队来到了云南,先是到蒙自黑坡那点(里),后来又搬到了这点(里)。我们这个村按照祖辈们的说法,就是一个军屯发展起来的村子,村子里除了姓郑的以外,还有姓陈的,姓武的,姓李的、张的,还有姓余的,可能是因为我们老祖公迁来得早,那会还是当官的,所以村名就叫‘郑营’。我们这点现在看着不好,以前那会出了很多秀才,还有进士呢。”<sup>②</sup>从老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到,郑营是一个典型的军屯村落,其自明代形成后,就特别重教兴文,明万历年间就修建了“五亩书院”和“张本寨书院”,到了崇祯庚辰科时,郑营的张一甲中了进士,清朝癸巳科时,张一甲的曾孙张汉有中进士,并授翰林,张汉于乾隆元年(1736)丙辰特举博学鸿词科,成为云南第一个两次翰林,因此张家也就成了“一门三进士”。<sup>③</sup>发展至今,郑营已成为“云南第一历史文化名村”。郑营只是明代众多军屯村落中的一个,其在发展中,在文教、商业贸易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

在建水历史发展过程中,在科举中我们可以看到“移民”的身影,这些移民进入地方后,在定居地方的同时,不仅改变了地方的人口结构,而且还促进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,移民促进了地方科举的发展,就像建水地区一样,一度发展成为“临半榜”,这种成就是与移民分不开的。

## 结 语

综上,无论是建水地区还是石屏郑营,乃至整个云南地区,元以降,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,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,更多的作为文化承载者的“移民”自身所携带的文化习俗,以及“耕读传家”的文教思想。这些来自“江南的大姓”和中州地区的移民,本身注重文教,他们在地方定居后,大力推行文教,从而带动区域社会发生变化。建水地区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,在政策的鼓励和自身传统的鞭策下,积极投入地方科举中,推动了地方科举的发展,促使建水地区遂发展成“诗书郡”和“礼乐邦”,被称为“滇南邹鲁”“文献名邦”,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中期在科举中更是出现“临半榜”的现象,这种盛况的出现是与移民的进入分不开的。移民进入移入地以后,其影响是方方面面的,科举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,当移民对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时,也会促进地方社会各层面的发展。本文立足于史料和地方学者的相关研究,主要阐释移民与地方科举事业的发展,以建水为个案,管窥移民与科举发展的内在关联性。

(该文系马斌斌博士学位论文中引言和第二、四章内容的节选部分,特此说明。)

责任编辑:刘毅

① 转引自赵晓凌主编,杨丰编著:《教育圣地——滇南邹鲁》,昆明:云南出版集团公司,2007年,第5页。

② 访谈时间:2022年2月16日;访谈人物:郑xx,94岁,男;访谈地点:郑营村内。

③ 高春林:《石屏郑营:云南第一历史文化名村》,昆明:云南美术出版社,2007年,第20页。